

第一章 语言·人·文化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

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人类使用的语言划归为两个范畴,一为“语言”(langue),另一为“言语”(parole)。前者指一个社会集团成员共有的符号系统,即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语音系统、语义系统等的总和,是静态的客观存在;后者则指该社会集团成员遵循符号系统的规则进行创作的行为,以及运用“语言”机能所创造出来的言辞,是动态的主体主观行为。笔者认为结合人类社会的语言实际及人类的语言实践来观察,索绪尔的关于语言的界定基本上符合语言的本质。笔者在本书中将要论述的内容,既有属于静态的“语言”范畴,也有属于动态的“言语”领域。

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家以对“语言”的描写作为研究的重头,从而一直忽视对“言语”的描写、解释。而索绪尔在承认“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①的同时,又认为“言语”是个人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

的、从属的、异质的；“语言”才是重要的、同质的。^①把“言语”看成是纯个人的、异质的现象有失偏颇。进入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语言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融合，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个体行为的“言语”不是单纯异质的存在，同一社会集团内的个体“言语”具有该社会集团的共有特征，言语表达浸透着本上的气息。描写、解释一个社会集团言语表达的共性，无疑将有助于探明该社会集团的社会特质、文化特征、民族精神。

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存在现象，而思维亦是人类特有的功能，语言、人、思维三者处于何样的关系呢？长期以来对思维的内涵所指呈混乱状况。针对思维内涵所指的复杂性，鲁宾斯坦曾说：“……解决问题之所以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问题的提法在一些情况下指的是思维（是一种过程，一种行为），在另一种情况下指的是思想（是这种行为的产物）；在一些情况下指的是语言，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指的是言语。”^②也就是说“思维”即可被用来指动态的、主体的精神行为，又可表示静态的、精神行为的产物。其实，无论思维是指一种过程、一种行为，抑或是指思想行为的产物，它都与“语言”和“言语”纠缠在一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语言”借助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产生，“语言”这一符号系统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认知并进行抽象概括的反映。反之，思维也是借助“语言”而进行的，它们的产物又表现为“言语”。主客观两个世界通过“语言”和“言语”而互相联系在一起。主观世界认知客观世界并抽象概括客观世界的方式方法不同或角度不同，其反映、描写、解释出来的客观世界也就不同。在“语言”符号系统方面则表现为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语义系统、表达系统的不同，这意味着思维即判断的不同。正因为“语言”符号系统是社会集团集

① 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5～36 页。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74 页。

体思维的产物,是他们思维的印记,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追根寻源去认识和把握该社会集团的集体思维的特征。

社会集团集体思维的产物——“语言”符号在长期的使用中又会起到规制、制约使用该符号系统人的思维方式的作用,从而在他们的“言语”表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语言”形式影响思维,思维形式又对“言语”表达产生影响,体现了“语言”、思维、“言语”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通过三者这种交叉关系探讨“语言”符号系统中各种层面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的理据,以及“言语”表达层面之所以然。

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流行的看法是: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①高名凯在他的《语言论》里反对这样的提法,他赞成谢德洛维茨基将思维与语言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的说法,并强调这一统一体应叫做“语言·思维”统一体^②,认为:“语言中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成了‘语言·思维’这一统一体的形式部分,作为思维活动材料的概念和作为思维活动的规律的逻辑关系是‘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的内容部分。语言被运用的时候存在于言辞,思维在进行时构成思想。”^③

应该注意到无论是语言的被运用还是思维在进行,都必须有人的参与。而人有其社会属性的一面,一个社会人必然带有其所归属社会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社会集团里,当它的“语言被应用”形成“言辞”、“思维在进行”构成“思想”时,一定会有被这一个社会集团认可的某种模式的存在。在“言辞”就有可能表现在词汇、句法上;在“思想”就可能在各种社会行为上体现出来。

① 参见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②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7页。

③ 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7页。

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

“文化”一词应该说是近年来很时髦的词，动辄冠以“文化……”或“……文化”，其多用几乎到了可与接头词、接尾词相媲美的地步。也许正是因为它被过多地使用，被它修饰或它所修饰的概念、范畴太广，以致人们难以看到它最初始的、本质的语义。同时，也许还因为可称之为文化的现象错综复杂，所以古今中外学者为给它下个准确并能为大家认可的定义颇费心思。笔者在此不作一一介绍，只援引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对“文化”一词所作的广义的解释，即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①

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延伸开来就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部分。从上述的广义解释以及我们在第一节中论述的语言（从这一节开始，为了行文方便，本书原则上使用“语言”一词，指广义的语言，即包含有索绪尔所言的“语言”和“言语”两个部分。一些特别需要区别的地方用“语言”和“言语”形式表达）与思维的关系来看，应该认为语言属于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范畴。除了语言之外，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制度、价值观、人生观等意识形态都属于精神文化。语言自身属精神文化，但同时它们又参与其他精神文化的形成。换言之，只要有人的思维活动存在的地方就有语言的存在。它们既然是这些精神文化的载体，是它们的承担者，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意识形态的投影。也就是说语言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意识形态来。

另外，该社会集团的生存状况、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轨迹等，这些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客观世界发展的诸多侧面，也会在该社会集团的语言中反映出来。例如，日语词汇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10页。

系统中一些类别的词汇量差别悬殊,表示鱼类、植物类、昆虫类的词汇发达,这与大和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地理文化紧密相关;另外,日语词汇系统中汉语词与和语词并存且互相渗透的历史事实与现状,都与日本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样,日语表记系统的纷繁复杂也是其国家历史发展原因导致的。经久不衰的敬语表达肥大化,可以理解为是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余韵;而主语表达萎缩化也是日本社会长期尊崇灭私奉公精神的一个屈折的反映。综上所述,一个社会集团集体记忆的“语言”以及该集团成员的“言语”都与该社会集团拥有的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语言”系统的理据性、存在与运用的可能性,“言语”表达的得体性、审美性、社会性等,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制约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社会的精神结构。“语言”与“言语”是存在于社会文化这一大背景、大前提下的“语言”和“言语”。“语言”和“言语”与文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包孕式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种层面。另外,“语言”和“言语”二者又处于一种共性与个性的互动关系之中,也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遵循一个社会集团集体记忆的符号规则建构“言语”表达,就是一个从共性向个性转化的过程。它虽然是个体的、一次性的“言辞”行为,具有一定的个性标志,但它运用的是共有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只是在表达时融入了个体的选择而已。因此“言语”的个性只能是在“语言”共性框架中的个性,不可能是超越整体共性的个性。

使用同一“语言”系统又隶属于同一文化模式中的个体,他们的“言语”在拥有个性或称为风格的同时又带有该社会集团“语言”的共性。比如当“言语”表现为日常的交流会话时,日本人之间的会话,各人可能在音声方面、选择词汇方面会有异质的要素,但在得体性方面一定是一致的,否则交流可能会归于失败。而当“言

语”表现为文章或文学作品时,这些文本可能会有文本作者的表达风格,如或偏爱使用汉语词,或偏爱使用长句等,但那些日语骨子里的东西,日语表达之所以成为日语表达的东西,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运用着。日语里风骨的东西、日语表达之所以成为日语表达的东西,运用得越多就越具有日本民族的特色。如和歌、连句、俳句等这些体裁,不管它是谁的文本都体现着日语“语言”方面的特点以及大和民族的思维特性、审美特性。

因此,“语言”与“言语”是一对受社会文化制约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正如个性(personality)与典型性(modal personality)的关系一样。个性(personality)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指个人拥有的、作为潜在势力的行为倾向的总和。^①人非孤立地存在,他要受到周围众多人的影响,要受他所属的社会集团、社会习惯、社会制度的影响,个人的个性或曰人格也是在社会文化的规制下形成的,没有超越社会文化而在真空状态下形成的人格、个性。因此可以认为个性或人格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是个体的或私的一面(individual or private aspect);一个是为文化规制的一面(culturally typed aspects)。^②也就是说对个性(personality)理论可以从个性的独立性一面(区别于他)和可供分析、可供观察的个性类型(类同于他)这两个方面进行说明。鉴于此,C. Kluckhohn 和 O. H. Mowrer 将个性(personality)概念进行再分化,指出它具有以下几个构成要素。^③

1. 普遍性构成因素(universal components),每个人都拥有蕴含共同特质的人格特性,如:①生理特性;②社会性动物特性;③文化性动物特性;④遵从自然法则特性。

① 参见[日]星野命编《人間と文化》,东京朝倉書店1979年版,第96页。

② 参见[日]星野命编《人間と文化》,东京朝倉書店1979年版,第96页。

③ 参见[日]星野命编《人間と文化》,东京朝倉書店1979年版,第97~98页。

2. 社会性构成因素(communal components),某一社会集团内的成员,他们互相拥有区别于另外社会集团成员的个性特征。

3. 角色性构成因素(role components),同样社会角色的人们拥有共同的特质。

4. 个性构成因素(idiosyncratic components),每个个体的生活都会有变异,即使同样的社会角色也会有比较独特的区别于他人的个性特征。

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等他们一方面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但同时人们又能从他们的言谈、行为中识别出他们归属的社会集团的“典型性”特征,这种“典型性”特征(modal personality)也许可以理解为国民性。

“语言”和“言语”是一个社会集团的产物,“语言”和“言语”的使用者和创造者是人,是一个有社会属性的人。当一个自然人通过后天的主客观各种因素的作用习得了他所归属的那个社会的语言、传统做法、行为习惯、社交礼仪等,又认知并体会到了那个社会的价值观、思想概念体系从而完成了社会化,他就将在这社会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大框架中,在这物质与精神系统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与自己气质、心智相吻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因为此,包括语言在内的一个社会的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它既被人们把握为是抽象的,又被把握为是具体的。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它是一种认识、观念、判断、制度,存在于人的精神思维中;反之,之所以是具体的,又因为它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具体的行为中、言谈里、精神作品里,反映在他们的具体的价值判断以及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制度中。它的精神文化体现在这些具体的各个方面,同时它又被把握为一个行为的集约。这里面也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弄清了“语言”、“言语”、“社会人”、

“思维”、“文化”之间立体式的交叉关系。第一，我们可以试图从“语言”和“言语”去窥视使用者——“社会人”的“思维”特征以及使用者所属的社会文化模式。第二，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人”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生存环境、历史发展等综合因素的考察来认识这个“语言”系统，尤其是它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表达系统，以便对它有更为理性的认识。第三，我们还可以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审视“语言”与“言语”的互动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以便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日语进化过程中“语言”和“言语”所发挥的各自的作用。第四，鉴于我们已经明白“言语”与“社会人”与“思维”与“文化”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审美表现等显性与隐性的文化现象来反观“社会人”的“言语”表达，以达到深化对“言语”表达的理解。

第三节 大和民族与日语起源

大和(やまと)现在是日本国的别称，古代日本最早的政权国名就为“やまと”，字写作“倭”。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时期将国名改成双字，遂取与“倭”字谐音的“和”字并冠以“大”字为“大和”。大化革新时期又据日出之处之意改国号为“日本”，仍训读为“やまと”。而将“日本”音读为“にほん”、“にっぽん”，则是奈良时代以后的事了。

悬浮于东海的日本列岛原先无人居住，日本列岛上有人类居住的历史现在可知的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是从岛外迁徙到日本列岛上来的。这些最先在日本列岛生活的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来自何处来到日本列岛的？有关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比较赞成埴原和郎先生关于“双重结构模式”的假设，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未必是单一人种在单一时期进入日本列岛。有可能是从一万年前绳文

时期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南亚系统的人迁入日本列岛生息成为日本人祖先的基础构成。这些绳文人的足迹遍布日本列岛,北达北海道,南至冲绳岛。之后,北亚系统的人在弥生时代从日本列岛西部上岛并在岛内不断壮大势力,在日本近畿地区建立起小国家并最终形成统一的大和朝廷。后来者的属北亚系统的弥生人与先到者的属南亚系统的绳文人混血融合,形成了当今的日本人。这些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先民,无论是南亚系统还是北亚系统,他们一定都拥有自己的文明。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原来不同文明系统的人们生活在共同的自然环境中,接受共同的自然恩惠,面对共同的生存问题,经营共同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近似的心理素质、近似的行为方式、近似的思维方式乃至共同的语言,遂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即社会形式,至此大和民族就产生了。

何谓民族?关于民族的解释经常与社会、人种的解释纠缠在一起。斯大林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满足以上几个关键词: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就具有一个民族的特征。1986年10月12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句“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招来日本国内外的批判。长期以来人们言及“日本人”、“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大多没有将现在生活在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人及阿伊努族文化包含在内。阿伊努族人无论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还是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上都具有作为独立民族的特征。

从人种学上讲并没有“日本人”这一概念,日本民族与亚洲近邻的民族在人种上无甚差别,均属蒙古型类黄色人种群,日本民族这一概念属于文化的、政治的范畴。从形质人类学观点看,日本列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岛上居住的人可分为三个类型：阿伊努人、本土人、琉球人。毫无疑问，阿伊努族的语言、文化乃至琉球诸岛人的语言、文化与本土的语言、文化是不同质的，不能和本土人的语言、文化混为一谈。笔者在本书中行文时使用的“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均指日本的本土人以及日本的本土文化。“本土”的确指是日本的四国、九州、本州。

日本民族使用的语言其祖语是何语言？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日本从事日语研究的学者们。有关日语的语系归属，常见的说法是：属于阿尔泰语系，马来语系，印度南部的德拉威语系等。从语言形态上看日语属于黏着语，除表示语义的实词外，还有后置于实词之后表示语法功能以及接续在用言之后表示语法范畴的虚词。

在遥远的远古时代，在日本列岛上生息的日本人一定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至少在距今近两千年前，日本民族的语言——日语只有音声形式而无表记系统。日语的书面表记系统是在汉字、汉文、汉文化的影响下经过几个世纪的吸收、积累、内化以及众多日本知识界人士的摸索实践，于10世纪（日本平安朝中后期）左右形成和汉混合体书写形式，成为现代日语书面语表记形式的基础。在表记系统从无到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随着汉文、汉文化的不断进入，日本民族对汉文、汉文化的理解不断深化。日本人在运用汉字、汉文进行表记母语的实践的同时，也已将汉字、汉文的影响带进日语的各个系统中去。也就是说，表记系统的发生、发展不是单纯的一种表记形式的发展，它的每一个阶段都与语言内容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处于互动关系之中。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日语在邂逅汉语之前它是纯色的，语音、词汇、语法、表达等系统还是纯日本式的话，那么，当它兼有书面表记形式时，表记系统本身自不待说，它的内容就已不是当初的原色了，里面浸淫着不少汉文化的色彩。这些也是笔者将要在本书论述的话题。

日本14世纪镰仓时代的一些神道家以及江户时代的一些学

者鼓吹日本曾拥有“神代文字”，认为在汉字进入日本之前，日本国已经拥有一种文字——“神代文字”。这些后被证实是后世的伪作。古代日语是名副其实的无文字语言，这个时期应该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与汉字邂逅。

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比邻，两国虽是近邻，但在遥远的古代其文明发展的阶段却不尽相同。当日本持续了一万余年之久的绳文时代的后期（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4世纪）还处于采集、狩猎的新石器时代时，中国大陆文明已进入相当发达阶段。日本的绳文后期弥生前期正值中国的周朝及以后的春秋时期，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阶段。青铜器、铁器的发明，农耕的普及，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文字使用、艺术实践、哲学思考等精神领域也光彩夺目。地理上与中国为邻，文明发展上处于后进地位，这一切宿命地决定了日本将从中国大陆输入比自己高级的、成熟的文明。而日本民族接触中华文明输入中华文明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中华文明的载体——汉字与汉文。

日本古史书《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年（大约是4世纪末5世纪初）朝鲜百济国王遣使者阿直伎进贡两匹骏马于日本天皇，此阿直伎还擅读佛典，遂成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天皇求贤若渴，在阿直伎推荐下又请精通典籍的王仁来朝为太子之师。日本另一古代史书《古事记》也记载王仁来朝时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汉文典籍进贡。这是日本古史书对有关汉字、汉籍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正式记载。实际上据考古研究及出土文物推断，早在王仁携汉籍来朝之前，日本人应当已经见识过汉字了。1784年日本北九州博多湾的志贺岛出土了中国史书《后汉书倭传》中记载的“汉倭奴国王”金印，从福岡县糸岛郡志摩町御床的松原遗迹等弥生时代中期的地层中，出土了被认为是王莽于公元前14年铸造的钱币“货泉”，这些虽只是只言片语，但至少可以认为日本人见识汉字要比王仁来朝早得多，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

左右。

汉字、汉文进入日本后很长一个时期被视为知识的象征，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它只在朝廷贵族中被认识、使用，与市井百姓无缘。日本古代文献多数使用汉字用汉文的形式表现，对于古代日本人来说，汉字、汉文毕竟是外国的文字、文体，以此来表现本国语言，其难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后来在与汉字、汉典接触，了解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受汉文化的刺激古代日本知识界意欲用汉字做表记手段来记录自己民族的语言。

众所周知，汉字是表意文字，形状方块，一字一个音节表一个语义，是音、形、意三者结合的符号，从语言学上讲属单音节语言(mono-syllabic language)。然而日语则属多音节语言(poly-syllabic language)，其音韵构造音节与语义不一定相对应，也就是说，一个词可以是一个音节，也可以是二个音节、三个音节不等，如：

か(蚊)
あさ(朝)
あした(明日)
かなしい(悲しい)
あらたまる(改まる)

鉴于此，古代日本人首先尝试将汉字的语义弃之不顾，借用与日语音声相近似的汉字用以表记日语。如用“可”字表记“か”音节，用“阿”字表记“あ”音节，这种借用在汉字造字法中称作“假借”。另外，古代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训音(“训”可理解为是对汉字的翻译，如“海”字的“训”是“うみ”)来标记日语的音节，如，“なつかし”表记为“名津蚊為”或“夏櫬”，这在汉字造字六书法中应属转注。

从4世纪初王仁携汉典入朝，古代日本朝廷开始接受汉字、汉典始，古代日本知识界历经几个世纪的苦心摸索，到8世纪时一套从音训两方面借用汉字的表记方法已趋成熟，担负着表记日语的

重任。奈良时代问世的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均使用了这种表记方式。因其表音文字系统在和歌集《万叶集》中体现得最为繁杂,后世人称此表音文字系统为万叶假名。万叶假名中通过假借方式形成的表音文字日本人称其为“音假名(字)”;而通过转注方法形成的则被称为“训假名(字)”。

古代日本人最初将万叶假名用于表记日语中的固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即在用汉字书写的汉文体文章中掺杂着纯粹用于表音的汉字来表示人名、地名。因此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在一篇全由汉字写就的文章里既有表意的汉字又有表音的汉字,而同是表音的汉字中既有音假字又有训假字,这给读者的阅读增添了很大的负担。《古事记》中共使用了 1521 个不同的汉字,其中有的用作表意,即训字,需要训读来理解;有的用作表音记录日语的音声,虽然著作者太安万侣加了训注、声注、音读注、解说注,但仍是一部难读的史书。

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人经过长期摸索实践总结出来的表音文字系统,它一方面体现了古代日本人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日本人渴求文字表记的迫切心情与执著精神。万叶假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用于各种文体的表记需求上,在古代文字应用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因汉字的表意特性以及汉字语音自身系统的原因等,使万叶假名从诞生之时起就陷入汉字的桎梏之中。

汉字表意的顽强性以及汉语音节数与汉字数比例严重失调,这两点在万叶假名的使用过程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上述言及万叶假名是在抹杀了汉字字义的前提下被运用的,但汉字的表意功能十分顽强,形、音、意三者紧密联系,尤其是形与意一旦结合在一起很难使人做到见形而不思意,汉字使人见形思意的作用不是轻易能被抹杀掉的。加之,古代日本人是在熟知汉字音、形、意的基础上进行借用的,因此要让日本人做到见字不思意就较困难,这就是

上述提到的《古事记》的著作者缘何要附加多种注释的缘故了,这是其一。其二,汉语音韵体系导致汉语里同音词大量产生,同时古代中国政权交替频仍,政治文化中心不断易地,各个时期不同政治文化中心的音韵体现在汉字词的发音上,输入日本的汉字音就有吴音、汉音、唐音之别,因此表现在万叶假名上的同音字(准确地说是近似音字)就更多,表记形式太宽泛。如:“やま”可有“夜麻、椰摩、夜摩、野麼、夜麼、耶麻、夜莽、椰莽、椰摩、耶麼、耶磨、也末、野麻、夜末、也麻、夜万”等如此庞大的表记阵容。^①其三,方块汉字笔画繁多作为表音文字在书写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以上三点是万叶假名使用上的局限性,也就历史地决定了它只能是那个过渡时期的角色,随着日本人文字运用实践的积累、表记形式屈折缓慢的变化,必将会有更加符合日语特点的表记形式出现。

日本古代奈良时期推行律令制,官僚制政权每日运行要制作多种文书,当时正式的文书均是用楷书书写的格调高雅的汉文体。但在书写非正式文件时为求速度就出现了草书的形式,这种草体化的万叶假名被称为“草假名”。草假名是介于汉字与平假名之间的字体,是平假名产生的母体。万叶假名的长期实践,朝廷衙门日常的文字处理活动,这些都成为推动简化万叶假名的动力,成为酝酿并创制出新的文字表记系统的温床。

草假名大约开始出现在奈良朝中、后期,东大寺正仓院所藏奈良晚期的文书中已见有两封草书体。经过近两百年的积累发展进入10世纪后,平假名以一种突发的气势粉墨登场。接触汉字、汉文化历几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知识界人士执著地追求如何更合理地借用汉字来更加准确、更加方便地记录本国的语言,尤其是用来记录非官方的、属于个人的生活世界、感情世界,如男女之间的情书、信件、抒发胸臆的和歌等。平安

^① 参见[日]松村明《国語史概説》,东京秀英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朝前期宫廷贵族男女们之间、贵族男女与宫廷女官之间、宫廷女性之间的信件往来、和歌唱答等，都不断地进行着假名文字的实践，这是平假名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平假名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逐渐从草假名脱颖而出从幕后走到台前，可以说平假名是奈良朝人的创意苦心经由平安朝人的实践才走到历史舞台上来的。

从万叶假名到草假名是一种量变，草假名依然没有脱离汉字的藩篱，而从草假名到平假名则是一种质变，它完全逃离了汉字的桎梏。从平假名外形人们已不能条件反射地辨别出是某个汉字以及它的语义来，这就使平假名拥有作为表音文字的资格。延喜五年(905年)纪贯之在他编撰的《古今和歌集》里首次使用了平假名，这是平假名表记系统的正式亮相，也意味着日本人此后可以摆脱万叶假名的不便，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了。无疑这对于古代日本知识界来说不啻是一种“表记革命”，故日本人将其视为日语创造领域的最大发明之一。万叶假名借用与日语音韵相近似的汉字表记日语，这是日本人受中国人使用汉字音译佛典词的启发和影响的行为，不是日本人的独创，平假名才是日本人的专利。

平假名出现之前日本知识界人士书写日语时经常遇到两难的局面，《古事记》作者太安万侣这样表达他表记日语时的两难心境：“……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①由于“训”只是用和语词对汉语词进行的翻译，无论从汉语方面来看还是从日语方面来看，表记与语义之间多有出人。对于既通晓汉文又看重和语语感的太安万侣来说，自有“词不达意”之嫌；面如若全用音假名来书写日语又显得冗长，不简练。平假名的使用只是解决了使用万叶假名时存在的训假名、音假名混淆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表达显冗长的困惑。

① 转引自部有恒、吕元明译《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序第2页。

除此之外，平假名文体还潜藏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易切分语义。读者们一定有所体会，即我们在阅读古代和歌作品时，在理解上有两方面的难点，一个是我们自己拥有的阅读古典作品的知识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作品中汉字词多少的问题。如果作品几乎是由假名写就的，那么由于语义节难以切分，往往导致阅读欣赏在第一阶段就告失败。反之，读者则能顺利地进入阅读的第二阶段，就有可能完成作品的欣赏。平假名诞生初期没有清浊音、直拗音之分以及促音的表记，这就更增添了理解上的困难。与万叶假名时代相比，在平假名时代初期，书写一方的负担是减轻了，但阅读一方的负担却没有因此而减轻。平假名文体的这种致命弱点也是导致为何现代日语表记形式依然是汉字词与假名平分天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这样，日本人在享受平假名诞生给他们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慢慢地察觉到以平假名为主体的表达显现出来的弊端，许多文人进行了反思。最终他们悟到平假名若不与汉字词共用，那么它的表达就显得贫弱，和语词与汉字、汉语词共用的文体才是最佳的表达方式。以平假名为主体的文章中虽也有汉字词的出现，但量少，只局限于表现季节以及自然的词汇，在切分语义上所起的作用甚微。而和汉混合文体里使用的汉字量要比以平假名为主体的文体多，这样就能起到切分语义把握句意的作用。汉字用于表示实词，平假名用于表示虚词，句中文节以汉字为标示一目了然，解决了以平假名为主体的文体里可能出现的误读、误解的问题。这种表记结构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虽有所消长，但一直延续到现代日语中，并成为日语表记基础之基础。

从日本人开始使用文字到他们得出这一结论大约花费了七百年的岁月，历史进入了13世纪，日语表记形式也进入和汉混合体时代。从表记方法与文体的关系来看，七百多年来日语经历了纯汉字表记的纯汉文体；表意汉字多用兼有表音汉字表记的和化汉

文体；在和化汉文体基础上使用表意汉字的同时，用言词尾及助词等施以小字体万叶假名表记的宣命体；使用万叶假名表记的万叶假名文体；以平假名为主体的平假名文体；和语词、汉字、汉语词共用的和汉混合文体。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上述几种表记方式以及文体，其产生和变化都是非常缓慢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形式出现就完全取代了旧的形式，而是新的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旧形式并存，旧的形式在新的形式普遍开来的过程中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日语书面语的历史事实是：总是处于各种表记方式、各种文体交织一起，呈众声喧哗的局面。

日语表音文字的另一系统——片假名出现于平安朝初期，其外形取自汉字的部分笔画。它发端于寺院里写经生们的文字实践。写经生们在书写佛经时用省笔画的汉字加在汉文旁边用作训读的标记。最初阶段字体不统一，到平安中期字体逐渐趋于统一。至此日语拥有了两套表音文字系统。促使它们产生的动因、发生发展的轨迹不同，各自担负的任务也不同，日本人很好地让它们各自物尽其能。

至此日语的书面语渐趋定形。从上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日语书面语形成的历史发展阶段里，表记方法与文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文体所指内涵与我们现代人所言说的文体有所不同。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日语书面语的发生发展中看出日语书面语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为自己定下了基本色调，即双重结构、双重色彩的性格。伴随着书面语的产生和发展，日本历史上留下无数汉文体及和文体的文献，古代史书的双璧《古事记》与《日本书记》堪称其代表。这两种在日本民族书面语发展的最初阶段形成的不同风格向我们谕示着日语书面语发展的轨迹，在日语的各个范畴里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双重格调的显性和隐性的特征。

日本文化源头的这种双重性格也意味着在此后的日本文化发展全过程中，本土性与外来性的融合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日